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严复学术档案

朱修春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本书为山东大学自主创新项目成果

严复学术档案

主 编 朱修春

副主编 李明慧 李国庆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复学术档案/朱修春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3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ISBN 978-7-307-12110-2

I. 严… II. 朱… III. 严复(1853 ~ 1921)—学术思想—研究
IV. B25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294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4.75 字数: 514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110-2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近三十年严复研究综述(代序)

严复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系统介绍西学和推动教育现代化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无论是在时人眼里，还是在后世研究严复的学者看来，严复的翻译工作、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中西汇通的理念都值得我们不断探究、反复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逐渐步入正轨，严谨化、科学化、社会化日益突出，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借助这股东风，关于严复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不仅探究得更为全面、细致，而且对于以往较少关注的层面也有着墨，涌现出不少较有分量的大部头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有关严复研究的论文达到2000余篇，著作150余本。严复学术研究会、严复研究会等专业学术机构的建立，以及各类纪念性与讨论性学术会议的召开，都推动了严复思想研究的深入拓展。三十年是一个节点，有必要作全面的总结概括，归纳严复研究的特点、趋向以及不足，以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便利。针对近三十年的研究动态，以往学者对于严复思想的综述性讨论多局限于政治思想层面，笔者有鉴于此，将试图从严复生平，严复的译介工作，严复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去探讨^①，力求全面。

一、严复生平研究

对于严复生平事迹的考证探讨，一直是严复研究的重点。早在严复

^① 近三十年中，对于严复经济和文学思想的讨论不是很多，所以笔者不单列条目，而是分别将其与政治思想研究和翻译思想研究放在一起略作讨论。

先生逝世后，各类年表、传记或是评传便层出不穷。陈宝琛的《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王遽常的《严几道年谱》、王允皙的《侯官严先生行状》、柯劭忞的《严复传》以及严复长子严璩辑录的《侯官严先生年谱》等论著都堪称佳作，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借鉴。

而近三十年来，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严复生平的研究呈现出了相互补充的两个特点。其一，综论严复生平的专著增多，力求全面、细致地概括严复一生。王棣、俞政合著的《严复》（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较为完整地记叙了严复的生平事迹，从“海军生涯”开始一直说到“病重辞世”，着重铺陈影响严复政治、社会思想形成及转变的事件，对严复的译著和思想变迁有着细致的探讨。陈越光、陈小雅的《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则着眼于严复的思想道路，在时代背景下突出了严复思想的发展轨迹，传统文化滋养下成长的严复，并没有固守孔孟之道，而是向西方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此外，欧阳哲生的《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牛仰山的《严复》（新蕾出版社 1993 年版）、杨正典的《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皮后锋的《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等都是研究严复生平不错的专著。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精力放在严复学术资料的整理上，王棣主编的《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便是其中的代表，该书按照诗文、书信、专著和按语四类收录了严复主要的生平著述，精而不杂，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史料基础。而王思义编著的《生斯世何必无情：严复家书》（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则另辟蹊径，整理了严复的家书，展现了严复不为人知的一面。

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颇具批判与反思色彩，自出版后，便对国内学者产生巨大震动。作者不囿于严复生平的叙述，“我不打算把这本书完全写成严复的传记。我的注意力将主要集中在他所关心的事和他的思想上”，^① 通过对严复几

^①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 页。

部重要译著进行分析,抽丝剥茧,逐层深入,论证严复独特的自由主义坚守和渴望国家富强的愿望。当然,书中的很多观点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汪荣祖就在《严复的翻译》一文中与史华兹进行了商榷。汪荣祖认为,史华兹的很多论点是建立在他所不能理解中国古文义法的错误判断之上。例如史华兹以严复翻译《天演论》时使用佛、道用语而认为严复具有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汪荣祖以为这正是史华兹不懂古文用典传统和句法的错误表现,“西方汉学家不通古文义法,以致有此漏见”^①。

其二,关于严复生平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专题研究大为拓展,呈现更加碎片化的趋势。在严复与时人关系的讨论中,王宪明以严复维新变法时期所作《辟韩》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探讨文章所涉及的人际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严复写作《辟韩》展现了他对中国专制制度强烈批判和彻底否定的态度,《时务报》将文章转载之后,张之洞特别授意屠仁守撰文批驳。王宪明却不以为然,通过对史料的细密爬梳,他认为《辟韩》一文,“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辟韩》,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②。王宪明不但对文章发布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而且从具体文本出发,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的写作心态、用词含义透彻剖析,从而得出结论,“张之洞之所以要《时务报》发《辨〈辟韩〉书》,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批《辟韩》的作者,而是因为《辟韩》一文犯了‘时忌’,可能会成为守旧派大员和社会上顽固人士向维新阵营攻击的口实,从而扼杀维新的一线生机和希望,故从保护维新阵地和维新志士出发,对《辟韩》一文进行了象征性的批评,其用心可谓良苦”^③。

① 汪荣祖:《严复的翻译》,载《中国文化》1994年第1期,第118页。

② 王宪明:《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3页。

③ 王宪明:《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27页。

关于学界一直争论的“光绪六年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的事，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较早提出了严复任职为“洋文正教习”的观点，他在书中指出，严复“在学堂的职务，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总教习’，而是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①。而马自毅在《“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一文中也指出，光绪六年（1880年），严复学成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的职务不是“总教习”而是“洋文正教习”。^②马自毅结合上海图书馆中李鸿章档案的相关史料，逐步考证了严复留学英国、任职北洋水师学堂等史实，同时他认为，严复升任总教习的时间应该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黄克武在《走向翻译之路：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严复》一文中，亦同样表示赞同姜鸣的观点，并且提出“总教习”是指驾驶学堂洋文总教习，可能是“洋文正教习”的别称。^③2006年，福建师范大学严复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召开了纪念严复逝世8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针对“正教习”与“总教习”的考订问题，作了总结：“进一步弄清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情况，详细说明严复由‘洋文总教习’（亦称‘洋文正教习’）一职开始其教学生涯以及由‘会办’到‘总办’的升迁过程，发前所未发。但‘正教习’等同于‘总教习’的说法，似可进一步探讨。”^④

二、严复翻译研究

梁启超曾经盛赞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这正

①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8页。

② 马自毅：《“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68页。

③ 黄克武：《走向翻译之路：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严复》，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49期，第6页。

④ 林平汉：《严复学术与思想研究新进展——纪念严复逝世8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72页。

是基于严复对译介西方名著的贡献。严复一生共译九部西学著作,数量虽然不多,但都可堪称精品。即使是以古文翻译,仍可不失原意,而且更有着不一样的典雅味道。严复在翻译实践中,提出了译文工整的三个原则“信、达、雅”,至今仍是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近三十年,关于严复翻译思想的研究,“信、达、雅”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而且探究越来越深入,显著的特点是理论性更强,评点更加理性。

关于严复翻译三原则的地位、定义及其相互关系,早在20世纪就有过广泛争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著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其中收录了37位译界学者的48篇论文,较为详实地记录了中国那几十年间翻译理论的发展状况。近三十年来,涉及“信、达、雅”标准的争论已然不多,大多数学人已经把它当做翻译中不容忽视的理论而进行研究,对标准本身的探讨渐趋减少,但总结性的文字明显增多。刘靖之主编的《翻译论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沈苏儒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罗新璋、陈应年主编的《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等都属此类专著。黄克武在《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分析,作者认为:“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对严复翻译事业的讨论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评估传统。这些评估环绕着严复所提出的信雅达的翻译三原则。”^①而汪荣祖则以“信、达、雅”为切入点,初步探讨了严复的翻译思想,他在文中指出,“严复以典雅的古文译笔,阐释近代西方玄理,把外国新酿,包装在古色古香的旧酒瓶中”^②。

严复的翻译不仅译介西方名著,更重要的是借助翻译的形式,传播西学理论,其中饱含他开民智的思想期许。颜德如进而指出,“虽然严复本人没有写过有关翻译思想的系统论著,但是综观他现已公开

① 黄克武:《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载《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第94页。

② 汪荣祖:《严复的翻译》,载《中国文化》1994年第9期,第118页。

的所有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翻译实有自己的比较系统的看法”^①。作者在论文中不惧繁琐，逐层深入，从翻译的前提、翻译的标准、翻译的宗旨、翻译的关键、翻译的素养、翻译的组织、翻译的动机七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概括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近年来，对严复翻译思想的研究，逐步呈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除了运用翻译理论进行深入考察之外，哲学、社会学的理论解析也开始出现在讨论的舞台上。王玲英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严复翻译中“信”的原则。作者认为，“严复的翻译实践和他提出的翻译标准‘信’是受融合他本人和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介入与操控也是一种必然，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因为严复在他的翻译年代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影响，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意识的精神洗礼”^②，作者通过对严复翻译实践的分析，并运用列弗维尔的翻译操纵理论，指出翻译实际上是由多重因素操控的结果。赵艳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意识形态对严复〈天演论〉翻译过程的操纵看翻译是改写》，作者以《天演论》为分析文本，主要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严复翻译过程的操控。类似的文章还有罗欢的硕士论文《从操控论角度研究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以及刘艳芳的硕士论文《严复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纵作用研究》等。

在翻译之外，严复文学思想的研究，却被普遍忽略，特别是严复的诗歌研究。由于严复翻译和写作用的是文言文，新文化运动之后，古文地位一落千丈，严复雅致的桐城派古文反而成了批评的对象。对严复文学思想一直缺少独创和有益的研究，很多附属在严复翻译、哲学思想的讨论中。随着近三十年严复研究专题化的不断扩展，这一现象有所改变。杨正典从严复的诗歌理论入手，初步整理了严复的美学思想。作者指出，“严复在创作动机、艺术趣味、形象思维等关键问

^① 颜德如：《严复翻译思想新探》，载《福建论坛》2005年第6期，第76页。

^② 王玲英：《严复翻译之“信”与意识形态操控》，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年第4期，第109~110页。

题上,都对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有着独立的探索和建树,而这一切,都将给后人以巨大的启示。”^①张修龄、马卫中同样从诗歌着手,以严复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论证严复属于“同光体”诗派,进而揭示了严复传播西方文化与固守旧诗观念这一矛盾现象的内在原因。^②在文学改革层面,张宜雷认为,严复不仅是翻译家和思想家,而且是19世纪文学变革的先驱。张宜雷提出五点设想,以支持他的结论,主要包括:严复引进进化论思想为文学变革提供思想武器;他将人性本体论引入小说领域,开“小说界革命”先河;他最早提出了文学审美价值论;他的散文吸收了西方论说文体注重逻辑论证的特点,在散文文体演变中起了重要过渡作用。^③同时,惠萍的博士论文《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着重探讨了严复的文学理念,并且进一步梳理了严复与近代文学变革的关系。韩国学者白光俊则从严复的写作手法着手,试图论证严复文言的书写观点,他肯定了严复为适应当时书写和传播环境采用文言作文的方法,“严复坚持用文言翻译,减少了守旧人士对西学的反感,可以诱导他们的眼界转向新的思想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复的书写还是有肯定的价值的”^④。不过,白光俊的论证略显单薄,猜测忖度的成分可能多一些。韩江洪的著作《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了,他以社会语言学、文体学、翻译改写论、目的论、翻译规范论作为理论基础,结合理论阐述、个案分析和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重点阐述了严复话语系统的内在机理。

① 杨正典:《严复诗歌美学思想初探》,载《文史哲》1991年第5期,第94页。

② 张修龄、马卫中:《严复诗歌初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70页。

③ 张宜雷:《严复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载《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5期,第71页。

④ [韩]白光俊:《严复的文言书写观点》,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37页。

三、严复政治思想研究

政治思想研究历来是严复研究中的学术重地，对严复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具有的经世救国思想、维新改良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剖析一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近三十年来，在已有基础上，亦不断深化。不但在严复的实践层面，而且从文本中挖掘潜在的思想倾向，使得严复政治思想的研究持续积累素材，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僵化不前。

比较研究的方法被广泛采用，很多学者将严复的政治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同时代的人物进行比较。俞政把严复和梁启超做了类比，作者认为，二者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取向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总的来说，严复的自由主义学术气息较浓，而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则明显更注重实用，特别是在自由概念的理解上，“梁、严二人都认为自由与奴隶相反对，其义为无拘无束，万不能曲解成放纵或放肆。但是梁启超一度把自由与自治混为一谈，而严复则始终坚持自由的实质就是自主”^①。接着，作者继续深入，针对两人在自由的重要性、封建中国的自由实质、自由的约束与限制、自由的坚守与维护、团体自由(国群自由)与个人自由(小己自由)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严复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观念。赵慧峰、俞祖华二人，将严复与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放在近代自由主义思潮传承的背景下作比较，他们都赞成渐进的改良方式，反对急风骤雨式的革命道路，主张温和的改革，而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民主宪政、经济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问题上，严复与梁启超既有着相似的思想倾向，当然也存在着不一样的路径选择。但在作者看来，从严复到胡适，他们二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属于“既有传承又有失落，既有发展又有失落，从而代表了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②。李双璧在《历史研究》上

① 俞政：《严复和梁启超自由思想的几点比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5页。

② 赵慧峰、俞祖华：《从严复到胡适：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承与调适》，载《文史哲》2010年第6期，第78页。

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严复与康有为的政治变革思想。作者从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改革方案、思想影响层面,逐步深入,层层递进,说明了严复和康有为对晚清思想变革的走向有着不同的功用与贡献。作者指出,“他们的变革思想之不同,不在于思想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之不同”^①,作者以时代背景为基点,分析指出,康有为是用传统治经方法和传统救国模式探寻救国道路的最后一人,方法虽旧,但政治思想却是新的。而严复则是以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第一人,与康有为相比,方法是新的,可政治思想上却相对保守。苏中立从理想社会模式的角度比较了严复和谭嗣同,作者以为,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在旗号、层次、思想资源、理论基础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主要包括:第一,都是从救国出发、以进化思想为指导而设计理想社会蓝图;第二,都有二级理想社会层次;第三,都有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第四,都提出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同时,作者也对比了严复和谭嗣同理想社会模式的不同之处,发现他们在思想渊源、具体内容、实现途径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②

对于严复政治思想的研究,不只是对严复自由主义的态度有着广泛的争鸣^③,譬如宪政观念、现代国家构建以及晚年政治思想转变情况,也是近年来受到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王宪明对于严复的建国构想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初步梳理,并以此为基础,认为我们对严复晚年思想应本着同情的原则,而不必过分苛责。作者认为,《社会通论》和《政治讲义》集中反映了严复对于三种“国家”形式的认识,辛亥革命以后,构想进一步丰满,“应该像西方国家建立各自独特的教化那样,改用新式机器来发掘和淘炼中国固有的宝藏,建立中华民族所

① 李双璧:《康有为严复变革思想比较》,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30页。

② 苏中立:《戊戌时期谭嗣同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之比较》,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第78~82页。

③ 相关分析参见李艳红:《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载《湘潭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90~91页。

特有的‘教化’，从风俗、民情、世道人心方面，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①。作者同时指出，所谓严复晚年思想的倒退，提倡尊孔读经，其实背后深藏着对民族文化的终极关怀。对于严复晚年政治思想的转变，史学界历来存在较大争议。传统观点认为，严复的思想属于早期进步，晚期反动。而近三十年来，这一评价体系逐渐松动，呈现了不一样的观点。其中杨正典的评价一针见血，“严复执着于他的渐进改良，于‘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成了掉队的先行者”^②。甄建均在《严复晚年思想的变化及其归宿》一文中直接指出，“晚年严复思想的变化过程，对今人谋求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有着远不得以‘反动’为名的深刻启迪”^③。同样，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赵群群认为，严复的政治思想在维新变法时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到了辛亥时期却与社会脱节。虽然作者主张严复政治思想的主流没有变化，但是严复“他所坚持的政治思想与时代发展的呼声不同步，因而是保守的、落后的”^④。同样，阳伶也持相近的观点，作者甚至认为，严复早期的政治思想是积极进步的，主张变法维新，但是进入晚年，他的思想却趋于保守落后，他主张教育救国，复辟帝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作者给出了三点：“第一，中国残酷的现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使他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第二，其庸俗进化论的理论思想决定其政治态度日趋保守；第三，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也是其思想落后的重要原因。”^⑤张平海、李爱峰在《严复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探析》一文中，同样指出：“辛亥革命后，其政治立场更为落后，不仅反对任何革命，就是其他变革也表示反对。其政治思想日趋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他

① 王宪明：《严复的建国构想述论》，载《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6页。

② 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③ 甄建均：《严复晚年思想的变化及其归宿》，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第101页。

④ 赵群群：《再论严复政治思想的转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载《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页。

⑤ 阳伶：《严复早晚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及原因》，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82页。

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形势，思想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不能与时俱进，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①实际上这些观点可以算是老生常谈，但也从其他层面作了较过去更为深入的探讨。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应该与时代背景相符合，放在过去的框架中，而不是一味地以今人眼光强求苛责，对于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不能简单地用“反动”、“落后”来概括。

近年来，对严复政治思想中的宪政成分，不少学者发文作了探讨，值得我们关注。任艳妮的硕士论文《严复宪政思想研究》对严复宪政思想作了系统梳理，作者从严复宪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内容以及评价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龙江在论文中指出，严复宪政思想的根源很多，人性论、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进化论、重商主义、个人社会经历等在其宪政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严复心中，新的宪政就是“限制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着重议会代表制，少数服从多数和政党制度及地方自治”^②。吴向红、杜力夫也认为，严复倡导的是反对专制、限制皇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不可求急、求快，“民主宪政制度的建设之所以不能太快，与其说是因为严复先生保守，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民主宪政历史的了解使然”^③。王建龙则认为，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富强而是“治道”。作者进而指出，“严复试图在追求富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保持富强的最好的方式，追求一种长治久安的‘治道’；不仅如此，严复希望把追求富强和保持富强的方式统一起来，使实现富强的方式与保持富强的方式一以贯之”^④。在此基础上，杨阳著《富强抑或自由：严复宪政思想研究》

① 张平海、李爱峰：《严复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探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3页。

② 龙江：《论严复的宪政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33页。

③ 吴向红、杜力夫：《严复宪政法治思想初探》，载《福建论坛》2007年第8期，第135页。

④ 王建龙：《试论严复宪政思想的终极目标》，载《福建论坛》2005年第4期，第68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一书,对于严复宪政思想的探究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总结。该书先是梳理了近代西方宪政思想的概念,然后以严复译著为考察对象,逐步展开对其宪政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发展演变的探讨。

严复的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不可分割、紧密相连,二者处于同种分析架构的思维衍生。严复在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后,将其命名为《原富》出版。通过书中案语,严复将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与观感充分展露。早在 1935 年,郑学稼在《严侯官先生的政治经济思想》一文中就指出,严复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受到普遍忽略,“年轻的人,知道译《国富论》的郭大力和王亚南,或许不知严复罢”^①。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严复当初倡导的经济思想在现在看来可能要幼稚许多,但严复毕竟是属于开创性的人物,他所译出的《原富》对于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古典经济学具有启蒙作用。近年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重视,相关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俞政在《论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中,针对严复在《原富》中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了讨论,作者认为,“它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指导,为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在中国创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的理论准备之一”^②。同时,俞政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探讨了严复《原富》以外文章中散见的经济思想。作者以为,严复不论政治,而以“救贫”作为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戊戌变法惨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人记忆犹新;二、严复撰文时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时不远,战败的创伤尚未治疗,巨额的赔款又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三、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已经深刻领会并且全面掌握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四、严复曾于 1901 年接受张翼的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

^① 郑学稼:《严侯官先生的政治经济思想》,载《文化建设》1935 年第 20 期,第 49 页。

^② 俞政:《论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载《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第 106 页。

事部的华总办之一。^①正是这四个因素,促成严复不问政治而关心经济建设。此外,李秀丽的《严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以及冯英的《析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都不同程度地探究了严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观点大同小异。

四、严复哲学思想研究

由于译介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名著,严复的哲学思想历来广受关注。特别是严复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他的翻译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简单介绍西方哲学思想,而且汇聚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严复的哲学思想研究长盛不衰,学者主要着眼于严复哲学的性质和地位,大概有四种课题:天演论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近三十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不但原有课题取得了新的进展,而且注重探究严复思想中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哲学观念。

关于严复哲学的性质和地位。杨宪邦认为,严复的哲学观是天演论哲学,“严复的哲学虽有实证论、机械论的因素,但基本上不是实证论,也不是机械论,而是天演论”^②。同时,杨宪邦肯定了严复哲学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严复的天演论哲学观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③李承贵则认为,“严复哲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如何对待西学、变法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侵略’等课题,从而使其哲学的唯物唯心性质不突出,而哲学功用性质特别明显;就其对

① 俞政:《20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5页。

② 杨宪邦:《论严复的天演论哲学》,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56页。

③ 杨宪邦:《论严复的天演论哲学》,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64页。

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看，可称为启蒙哲学”^①。杨正典指出，严复的哲学中虽然有实证主义倾向，但不能就此认为是实证主义哲学。严复“以近代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以及星云说、以太说为思想基础，建立了进化唯物哲学理论”，可以称之为进化唯物哲学。^② 陈国庆、刘惠娟同样认为严复的哲学思想是进化论，但他的进化论不是纯粹西方式的，而是结合时代特征，吸收、借鉴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进化论理念而形成的新进化观，并且影响国人认识到实现富强和图存救亡的重要性。^③ 陈遵沂则通过史实论证，严复不但对近代西方的实证方法和逻辑方法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大力提倡，在当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④

关于严复哲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张岂之、陈国庆在《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一书第七章中着重探讨了严复“开明自营”的新伦理观，作者认为，严复具有开明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和改造国民道德的“三民”主张，这与过去的道德观是有所不同的。^⑤ 徐曼也认为，严复“在宣传、介绍西方近代伦理道德学说的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进行了整理和改造，形成了由进化伦理观、自由平等伦理观、‘开明自营’、‘背苦趋乐’伦理观构成的伦理思想体系”^⑥，不仅使国人获得了新知，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传统伦理学输入了一套新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李承贵则认为，严复作为汇通中西学的大师，借助西学，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全面透视，并且进行改造和更新。作者同时指出，严复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改铸主要表现在义利关系、群己关系、自由责任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善恶

① 李承贵：《建国以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第105页。

② 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③ 陈国庆、刘惠娟：《严复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载《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36页。

④ 陈遵沂：《严复对西方近代实证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认识》，载《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10期，第46页。

⑤ 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9页。

⑥ 徐曼：《严复伦理思想探析》，载《理论月刊》2011年第5期，第43页。